



· 安徽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术文库 ·



中国现代叙事文学的情感与叙述

ZHONGGUO XIANDAI XUSHI WENXUE DE QINGGAN YU XUSHU

方维保 著

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



· 安徽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术文库 ·



中国现代叙事文学的 情感与叙述

ZHONGGUO XIANDAI XUSHI WENXUE DE QINGGAN YU XUSHU

方维保 著

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

· 芜湖 ·

责任编辑:胡志恒 彭 敏
装帧设计:杨 群 欧阳显根
责任印制:郭行洲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现代叙事文学的情感与叙述/方维保著.—芜湖: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12
(安徽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术文库)

ISBN 978-7-5676-1666-0

I. ①中… II. ①方… III. ①中国文学—现代文学—叙事文学—文学研究 IV. ①I206.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266838号

本书由安徽师范大学教育基金会宝文基金资助出版

中国现代叙事文学的情感与叙述

方维保 著

出版发行: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

芜湖市九华南路189号安徽师范大学花津校区 邮政编码:241002

网 址:<http://www.ahnupress.com/>

发 行 部:0553-3883578 5910327 5910310(传真) E-mail:asdcbsfxb@126.com

印 刷:安徽芜湖新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版 次:2014年12月第1版

印 次:2014年12月第1次印刷

规 格:700×1000 1/16

印 张:17.5

字 数:280千

书 号:ISBN 978-7-5676-1666-0

定 价:35.00元

凡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版图书有缺漏页、残破等质量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总 序

安徽师范大学文学院的前身是 1928 年建立的省立安徽大学中国文学系,是安徽省高校办学历史最悠久的四个院系之一。这里人才荟萃,刘文典、郁达夫、苏雪林、周予同、潘重规、卫仲璠、宛敏灏、张涤华、祖保泉等著名学者都曾在此工作过,他们高尚的师德、杰出的学术成就凝固成了我院的优良传统,培养出了一大批出类拔萃的各类人才。

文学院现设有汉语言文学、汉语言、秘书学、汉语国际教育等 4 个本科专业;文学研究所、语言研究所、古籍整理研究所、美育与审美文化研究所、艺术文化学研究中心等 5 个研究所(中心)。拥有中国语言文学博士后科研流动站,中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博士点,中国语言文学、艺术学理论 2 个一级学科硕士学位点;设有中国古代文学等 10 个硕士学位二级学科授权点和学科教学(语文)、汉语国际教育两个专业学位点;有 1 个安徽省 A 类重点学科(中国语言文学),3 个安徽省 B 类重点学科(中国古代文学、汉语言文字学、中国现当代文学);1 个国家级特色专业建设点(汉语言文学专业),1 个国家级教学团队(中国古代文学),2 门国家级精品课程(文学理论、大学语文),1 个省级刊物(《学语文》)。

文学院师资科研力量雄厚,现有专任教师 82 人,其中教授 26 人,副教授 40 人,博士 51 人。2009 年以来,本学科共主持省部级以上科研项目 74 项,其中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20 项(含重大招标项目 1 项),获得省部级以上奖励 13 项。教师中,有国家首届教学名师 1 人,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 12 人,皖江学者 3 人,二级教授 8 人,5 人入选省级学术和技术带头人,6 人入选省级学术和技术带头人后备人选。

走过 80 多年的风雨征程,目前中文学科方向齐全,拥有很多相对稳定、特色鲜明的研究领域。唐诗研究、“二陆”研究、宋辽金文学研究、词学研究、现代小说及理论批评研究、当代文学现象研究、《文心雕

龙》研究、古典诗歌接受史研究、梵汉对音研究、句法语义接口研究、儿童语言习得研究等在全国居于领先地位或在学术界有较大影响。特别是李商隐研究的系列成果已成为传世经典,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北京大学教授袁行霈先生说,本学科的李商隐研究,直接推动了《中国文学史》的改写。

经过几代人的薪火相传,中文学科养成了严谨扎实的学术传统,培育了开拓创新的学术精神,打造了精诚合作的学术团队,形成了理论研究与服务社会相结合、扎根传统与关注当下相结合、立足本位与学科交融相结合、历代书面文献与当代口传文献并重的学科特色。

新世纪以来,随着老一辈学者相继退休,中文学科逐渐进入了新老交替的时期,如何继承、弘扬老一辈学者的学术传统,如何开启中文学科的新篇章,成了摆在我们面前的迫切任务。基于这一初衷,我们特编选了这套丛书,名之为“安徽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术文库”,计划做成开放式丛书,一直出版下去。我们认为对过去的学术成果进行阶段性归纳汇集,很有必要,也很有意义,可以向学界整体推介我院的学术研究,展现学术影响力。

现在呈现在读者眼前的是第一辑,文集作者均是资深教授或博士生导师,有年高德劭的老一辈专家,有能独当一面的中年学术骨干,有崭露头角的青年才俊,可以反映出文学院近年科研的研究特点与研究范式。

新时代,新篇章。文学院经过八十余年的风雨砥砺,取得了辉煌的成就。赭塔晴岚见证了我们的发展,花津水韵预示着我们会更上层楼;“傍青冥而颀颀白日,出幽谷而翱翔碧云”。我们坚信,承载着八十多年的历史积淀,文学院的各项事业必将走向更大的辉煌!

我们拭目以待……

丁 放 储泰松
2014 年 8 月

前 言

中国现代文学,虽然只有短短的三十余年,但却是悠久的历史文学史中最具有革命性的一页。白话文运动以降的现代新文学,不但创造了现代汉语,而且创造了一种可以沟通世界的新的思想文化和情感表达方式。

中国新文学其实就是新文化知识分子情感姿态的展现。鲁迅、郁达夫、朱自清、曹禺、老舍、巴金、沈从文等一代新文化知识分子,在对待传统的道德文明的态度上,其立场上是鲜明的,但是,他们作为转型期知识分子的复杂性在于,叙事作为自我的言说,又不是绝对的理性所能控制的。他们的言说充满了悖论。在他们的作品中,既有新文化知识分子对于历史进化的信奉,又有因现实遭遇而形成的退化论历史观;既有着对于个性解放的热烈的践行,又有着旧时代士大夫情结的纠缠;他们身处现代性的场域中,享受着现代性的饕餮盛宴,又洞穿现代性的危机,企图为国人找到一个寄存人性理想的世外桃源。在他们的叙述中,现代知识分子的形象是精神性的,当然也是矛盾的和痛苦百结的;在他们的叙述中,现代知识分子都是思想者,他们思考着科学与启蒙,又顾忌着传统信仰的崩溃给人民所带来的灵魂无处寄放的痛苦;他们展现着现代社会中传统宗法伦理的怪诞形象。新文学之叙事文学展现了新文化知识分子的精神结构和人生姿态。

新文学之叙事文学,在叙述自我和外在世界的时候,有着一套自己的叙述策略。叙述和修辞的分析,看上去是形式问题;但我认为,新文学的叙事和修辞总是关联着它的文化历程。叙述结构是精神结构的凝结和外化的形式。一种叙事和修辞的运用总是包涵了作家的价值观和作品的价值取向,作家总是试图通过某一种叙事和修辞来实现一种意图。还有一个层面,叙事和修辞有着鲜明的时代和民族的烙印,甚至阶层和阶级以及党团的烙印。叙述涉及伦理,伦理只有通过

叙述才能显现。但道德情感伦理和叙述伦理是两个问题,文学作品中鲜明的道德情感是伦理的范畴也是思想内容的范畴;文学叙述中的伦理则是另外一个问题,有着强烈的形式主义的因素,叙述伦理包涵着叙述的策略;当然,叙述策略中也体现着价值倾向和情感伦理。新文学的题材选择、情节设计以及故事的展开方式,总是有着价值的选择。无论是启蒙者还是红色革命者,启蒙是他们自负的历史责任,于是,改写和洞穿传统的题材,颠覆传统的故事讲述方式和演绎路径,成为他们乐此不疲的叙述策略;女权主义,只是叙述自我,但是却将一个老掉牙的三角恋爱故事的男权主义叙述方式颠覆再造为女权主义的叙述结构;张恨水的叙述方式,更多地联系着报纸传媒,他的连载小说在那个时代却暗通着古老的说话艺术,对于消费市场和受众的考量,使他选择了古怪的现代章回体的叙述方式。在现代叙事文学中发现古老的叙述结构,这是文化人类学的考察,现代与传统精神沟通的考察。但是,新文学的叙事毕竟有着太多的西方经验和现代文化因素,新文学走向成熟,其实就是叙事的成长。

左翼“革命文学”是现当代最为蓬勃的文学乃至文艺的思潮。“左翼”这一术语,从一般意义来说,狭义的“左翼”就是1930年左联成立后的左联文学。但是我认为它与此前的“革命文学”和此后的“延安文学”以及当代五六十年代的“人民文学”在文化精神和审美风尚上都有着一脉相承的联络,所以在概念的使用上,由于文章发表年代的差异,不同时期会使用不同的概念;文章放在一起给人混用的感觉,而“混用”恰恰说明了我对它们之间共同性的认同。左翼“革命文学”的最大问题是文学话语中的知识分子的情感处理和阶级地位的叙述问题。左翼“革命文学”在长期的革命实践和文学实践中铸就了自己的人民伦理秩序。这既是一个价值倾向问题,又是一个叙述伦理问题。而知识分子对于左翼文学想象的介入和退出,无论是作为创作主体还是作为形象主体,自始至终都处于焦虑之中。我试图描述出它的历史流变,并通过流变的描述以揭示文学话语和政治话语的本质。

苏雪林在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是无法与鲁迅、曹禺等人匹敌的。但她却是不入潮流的女作家,无论是政治上还是创作上都是如此。通过一个边缘性的女作家的研究,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女性知识分子从叛逆传统到回归家庭,从张扬自我到皈依国族的历程。她虽为女性,但

也与所有的“五四”一代知识分子走着一样的人生道路和文学道路。苏雪林的学术研究,既包括中国古代文学与文化,也包括现代文学批评与文化批评,其独特性是有目共睹的。她的方法论和学术实践,对中国现代学术、现代文学史,乃至现代文学学科的建构都有着自己的贡献。

我的现代文学(尤其是叙事文学)的研究一直沿着文化精神分析的路子走。无论是关于精神内涵还是关于叙述策略的研究,无论是综合性研究还是个案研究,一直贯穿着文化精神分析的方法论。我的论述有着跨时代和跨族际的特征:立足于中国现代文学,但绝不限于现代还是古代,文学还是文化;我的论述可能有着结构主义的痕迹:寻找现代文学的精神结构和叙述结构,发掘这种结构的渊源和新变。这是我乐此不疲的工作,也是做现代文学思潮研究的思维惯性。

目 录

总 序	1
前 言	1

第一辑 新文化知识分子的情感姿态

《茶馆》：“世变”“民生”与民族寓言	3
祥林嫂的人生困境与鲁迅的现代性焦虑	
——以《祝福》为中心	14
现代士大夫的艳情白日梦	
——以《荷塘月色》为中心	25
血仇困境中的人性与阶级救赎	
——以《原野》为中心	30
乡土乌托邦的破毁与重建	
——以《边城》为中心	39
浮游在梦想与现实的边缘	
——论郁达夫的性爱叙述	48
爱的黄金分割：三部中国文学作品的精神分析学研究	60

第二辑 新文学的叙述策略与文化立场

叙述祛魅：科学语境中的中国新文学	71
现代化进程中的新文学叙事成长	82
论报纸副刊连载体式与张恨水小说章回体选择的关系	94
叙事·时代与性别政治	
——《莎菲女士的日记》与《红楼梦》之比较	104
戏仿中的颠覆：《阿 Q 正传》的反传统修辞策略	111

现代“革命文学”:别一种意义上的启蒙修辞	116
从宗法叙事到阶级文本	
——论 20 世纪 30—60 年代的红色浪漫主义	127

第三辑 现代左翼“革命文学”的情感伦理

论左翼文学的人民伦理秩序及其道德情感的形成	137
文学书写的情感祛魅与知识分子的主体隐身	
——对 20 世纪红色罗曼司的一种理解	157
左翼文学的血统化和知识分子的隐退	172
普罗文学的建构焦虑与创作主体的再造	185
成长:从家族英雄到阶级战士	
——20 世纪 40—60 年代的红色罗曼司	198
碰撞与调适:1942 年的延安文学生态	206
托洛茨基与中国现代左翼文艺	215

第四辑 苏雪林的文学创作与学术研究

出游与回归:现代知识分子的成长寓言	
——论苏雪林的早期创作	229
国家情怀:现代知识分子的成年镜像	
——论苏雪林的战时创作	238
论苏雪林的文学批评实践及其对新文学学科创立的贡献	247
论苏雪林学术研究的品格	259
后 记	269

第一辑

新文化知识分子的情感姿态

《茶馆》：“世变”“民生”与民族寓言

五六十年代的中国当代作家大多有意识地书写中国近现代历史,社会主义立场与想象革命的方法大致相同。这种历史意识促使他们在文学想象中总是关注历史时间的流动,努力去阐释某种规律性。这些文学叙述大多是近现代中国本土的历史经验,因而不无现代中国民族寓言的色彩。老舍的话剧《茶馆》无多革命,也没有后设社会主义的预见,相反是一种对“世变”的关注,普通民生的痛苦与情感成就了其立场,在此基础上老舍有否定进化与改良的历史认知,因而形成其不离近现代中国历史经验的民族寓言。

老舍心目中有其个人的中华民族的现代历史,他对民族性格的抽绎也不同于 50 年代的现成解释,老舍没有直接表白过他的认知,而是借助于“茶馆”这个特殊的时空结合体,在场面上活动着的形形色色的人物之间的关系中自然流露了他的认知、价值判断,他的集中凝练的艺术呈现中包涵有民族寓言性。

《茶馆》的民族本体寓言的方式,极大地区别于中国现当代文学中盛行的具体历史语境中的形象与性格的叙述。后者的最大特点,是以某个人物作为叙述的中心,在叙述的过程中展现这一形象的性格和命运,个体往往是叙述的焦点,其指向多在于个体本身。虽然这样的形象也有着某种时代的意义,甚至集体的意义,但也大多只指向某一阶层或某种势力,它并不指向民族本体。30 年代中期,夏衍的《上海屋檐下》采用了一种集体表现的方式,将底层社会中的各色人等放到一个大杂院中,来整体表现底层社会的生活状态和生命状态。大杂院以及生活其中的人们,于是就成为底层社会的象征。不能否认夏衍的创

作有寓言意味,但上海亭子间式的大杂院的所指并不是整个的民族而是特定的底层社会。老舍与夏衍的集体表现,在表层相似下面,有着更大象征度的区别。

《茶馆》似乎承续着《上海屋檐下》的集体象征方式,但老舍与夏衍的选择性指向不同,它所展现的是“群体的形象”,而这个群体的形象,并不指向某个特定群体,而是指向社会中的每一个阶层。假如说《上海屋檐下》所指向的是底层受压迫阶级的话,老舍则指向的是整个中华民族。《骆驼祥子》时代的老舍注重写人物的性格命运,而《茶馆》则注重写民族的命运,“在《茶馆》中他写的是一群人,他把舞台的注意力放在了国家和民族的命运上”^①。可以说他的创作经历了一个“从写人物性格到写民族的命运”的嬗变。

任何民族都是一个整体,任何一个整体都是由众多不同职业和社会层级的个体所构成。在对于民族的表现中,单个个体是无法代表整个民族的,只有将那个民族的社会各个层级的人都展现出来,才能显示那个民族的整体风貌。

《茶馆》首先采用了群体展现的方式,作者将中国从近代到现代的三个历史阶段里可能出现的人物,都安排到舞台上,来了个“集体亮相”。《茶馆》中的人物虽然大多都具有独特的个性,但是从其中的人物身份来看,作家还是试图让其中的每个人物,或者说绝大多数人物都能够成为那个阶层的代表,甚至成为那个阶层的符号。如秦仲义就是民族资产阶级的符号,王利发则是小工商业者的符号,而常四爷则是旗人中自省、自强意识者的符号,两代二德子等则是特务的符号,黄胖子则是不显山露水的流氓的符号,大小唐铁嘴则是保媒拉纤者的符号。再如太监,以及国民党的官员等都有特定社会阶层或势力的符号的特性。这些人物具有职业和社会阶层的高度概括性,从高等级的人物如太监到低层次的人物如被贩卖的妇女,从职业高贵的民族资本家到职业被鄙视的“媒人”,还有处于社会中间层级的人物,如特务打手、小流氓、茶馆老板、大学生、士兵等。《茶馆》聚拢起一个民族在那个时代里所应该有的职业和阶层,给他们一个表演的舞台。《茶馆》出场人物很多,但从不重复,职业和身份都不相同;虽然有的职业可以父子

^① 马云:《老舍的话剧创作与舞台视野》,《文艺研究》2006年第11期。

“相承”，但是老二德子和小二德子却不可同日而语，无论是职业还是性格都是如此。老舍对于人物的如此安排，既有时代的因素在人物安排中起作用，但更多的却是他对于人物代表性的考量。

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民族共同性格，但是民族的共同性格却是由各个个体的性格抽象与整合而来的。在《茶馆》中，老舍不仅给每一个人物都设计了一个那个时代所应该有的身份和职业，也给每一个人物都设计了一个与他的身份和职业相应的道德形象和性格特征。如王利发，与他茶馆老板的小有产者职业身份相应，特有的是患得患失的性格和圆滑的处事方式；如秦仲义，与他的民族资产阶级身份相应的是他实业救国的壮志雄心和失败后的脆弱个性；再如常四爷，与他的落魄旗人身份一致的是他愤世与奋争；再如二德子，他的身份就是一个特务，他的性格最突出的就是小特务的横行霸道和狗性；再如乱兵、国民党党棍等，都有着与他们的身份和职业相一致的性格。老舍几乎是“先入为主”地根据人物的身份、职业给所有的人物设计了各自的性格和道德形象，对于整个剧作来说，每个人物的性格和品行都有鲜明而确定的内涵。每一个人物，其职业、性格品行都成为一个民族在特定历史时代某一方面性格和道德品性的符号。老舍不是通过一个个体来表现民族性格的丰富性，而是通过众多人物以及他们各个个体鲜明的性格的汇集，来展现民族性格的丰富性和多样性。

“茶馆”显然是一个具有北京特色的民族象征物。尽管《茶馆》的人物形象“三教九流”，性格品性丰富多样，但都“集合”于“茶馆”的场面上，这个场所是老北京人的生存之地的象征。在戏剧场面上的多重多样的人物关系中，中国的民族性得以显现。什么是民族性？按别林斯基的看法，“那是民族特性的烙印，民族精神和民族历史生活的标记”；它是“某一民族、某一国家的风俗、习惯和特色”。^①出入裕泰茶馆的茶客们体现出来的风俗、习惯、言谈举止，烙印着中华民族尤其是旗人的标记，正是他们在戏剧场面上的“动作”印证着中华民族的精神和晚清、民国初年和40年代后期生活的特性。“茶馆”这个中国民族生存之地，具有强烈的符号性。它正是老中国的符号，它所体现出的中国民族风俗特色以及所体现出的性格秉性，与寄身其中的秉承传统中国

^① [俄]别林斯基：《别林斯基选集》（第一卷），满涛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版，第107、190页。

文化的人,具有身份和品性的契合。那些职业身份各异、社会地位层级不同、性格秉性千差万别的茶客们,当他们汇聚到这里的时候,便被提炼出了一个共同的文化性格和道德品性,这就形成了一个共同的形象——老中国的形象,形成了一个共同的民族性格——中华文化的性格。茶馆的场面就具有了某种寓言特征。

老舍利用茶馆这一舞台,将中国民族中的各色个别形象汇聚、展现出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茶馆”是老舍用来展现中国民族的象征物,民族才是他所要真正表现的,其中的个体人物是民族性阐释的具象,是用来表现中国民族性格和命运的符号。正如有的学者所看到的,《茶馆》“不是要讲述某个具体故事的戏”^①,当然也不是要讲某一个人的故事,而是要讲一个民族的“总体”故事。所以说,《茶馆》是一部民族寓言。

二

民族在时间向度上属于历史范畴。《茶馆》作为民族寓言,在于它是一部借助于近现代生活的风俗画表现的民族生存状态的寓言,三个历史的“断面”组成一部近现代中国民族的命运变迁史。《茶馆》是在历史的维度上来表现民族的生存状态和命运变迁的,其中有老舍的中国民族命运的近现代历史变迁的个人认知的历史逻辑。他的认知其实和中国革命史的宏观历史逻辑暗中抵牾。

写实的文学注重特殊情境中的细节,象征的文学则用类似于细节的意象去征指更广大的意涵空间,老舍的《茶馆》能够在生活场景中处处落实,却又能不拘泥于实情实境而有更广时空的象征意蕴。《茶馆》的三个历史断面体现的正是这种写实与象征融合无间的境界。它展现了中国近现代历史生活的三个“断面”:第一,在满清王朝运数将尽的年代,北京的裕泰茶馆依然一派“繁荣”:年轻精明的掌柜王利发,各方照顾,左右逢源;登场者提笼架鸟、算命卜卦、买卖古玩玉器、玩蝈蝈蟋蟀,无所不有;“繁荣”场景的背后是令人窒息的社会衰败,洋货充斥市场、农村破产、卖儿鬻女、太监买老婆、爱国者遭逮捕。第二,民国

^① 关纪新:《老舍评传》,重庆出版社1998年版,第450页。

初年,连年不断的军阀混战使百姓深受苦难,北京城里的大茶馆都关了门,唯有王掌柜改良经营,把茶馆后院辟为租给大学生的公寓,正厅里摆上了留声机。尽管如此,社会上的动乱仍波及茶馆;难民流落街头,乱兵抢劫,侦缉队不时前来敲诈,动荡不安、是非难辨的大环境让小老百姓无所适从。第三,又过了三十来年,风烛残年的王掌柜再度改良,甚至引进女招待以支撑场面;日本投降了,国民党又使人民陷入了内战的灾难;吉普车横冲直撞,爱国人士惨遭镇压,流氓特务要霸占王掌柜苦心经营了一辈子的茶馆。

三个断面分别构成独立的空间,场面上的人物符号指示特殊的历史情境:“太监”标示封建王朝,“乱兵”标示动乱的民国初年,“接收大员”标示战后的国民党统治时期。在场面的断续之间,带有符号性的人物、风俗,明确地指向近现代中国历史的某一阶段,从而使《茶馆》具有了历史叙述的特性。《茶馆》中以一当十的符号,庞太监、乱兵甲乙、“莫谈国事”等,使剧作的历史叙述不同于一般意义的历史再现。更为重要的是,在三个“断面”中,老舍关注的焦点是人物在历史中的生存状态,历史世变的阶段性呈现空间化而成为特殊情境。

三个场面中的具象生活写实空间的呈现,超越具体场景的国家民族的象征效果,二者结合成为《茶馆》的标志性成就。纷繁的人物、事象往往会造成一种“堆积”印象,看《茶馆》却没有这种感受。根本原因在于三个“断面”实际上若断若续,似“断”还“续”,在两个断面之间的隐含时间中,有老舍的个人历史认知逻辑的一致性。这个一致转化为叙述技巧,就是将两个场次之间可能发生的不在舞台上呈现的人和事集中调度到显性的空间场景中来,凸现老舍的世变认知,在“变”与“乱”中,王利发象征的民生的困顿便是国家民族灾难的寓言化表达。

历史是一种文化层面上的时间性叙述,《茶馆》三个场景的空间流转的呈现正是在历史的时间轴线上进行,每一场景成为一个时间节点。《茶馆》三个时间节点上丰富复杂的生活事象都具有“时代”特征:第一是“戊戌变法失败之后的晚清”,第二是“军阀混战时期的民国初年”,第三是“抗战胜利后的国民党统治时期”。这三个时间节点的顺序标示了“晚清”“民初”到“抗战胜利后”,它们依照线性的历史发展顺序来安排。它的顺成时序符合人们对现实时间形态的感知方式,但是场景流转后的时间跨度(人物的衰变)与世相变异却让观众不无讶